

孙子的价值、思想与西洋兵法

第一 孙子价值

中国之有兵法，始于黄帝，史载黄帝经七十战而定天下，历代史书的艺文志里，关于黄帝兵法的记载，种类很多，可是我们没有方法看到这些书。相传黄帝之臣，风后氏有兵法握奇十三篇，为宋以后一般研究兵学的人所祖述，但我们详察它的文字，或许是依照唐朝的独孤及（唐洛阳人，字至之，天宝末举高第，补华阴尉，代宗以左拾遗召，既至，上疏陈要政，改太常博士，历任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课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卒谥宪，及喜览拔后进，性孝友，为文彰明载善恶，长于议论，有毗陵集。）的八阵图而成的一部伪书。所以汉志、隋志、唐志都不书，而惟宋志载有之，帝王世纪说：「黄帝得风后氏于海隅，遂登以为相。」那末风后是否谙兵法，尚是一个疑问。又有封胡氏五篇，汉书艺文志已决定它为伪书。又有力牧兵法十五篇，史记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班固说：「力牧，黄帝臣也。」帝王世家说：「黄帝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寤而叹曰：『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于是依占求之，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又有鬼臾区三篇，鬼臾区是黄帝臣，是占星之官。在上面这些记载中，只有力牧之书，或许比较可靠。黄帝之后，又有太公兵法，但这些兵法的内容如何，现在没有方法去考证发现，其中或有流传，则伪书的成份多，真书的成分少，当然不能代表当时军学思想。我认为古代兵法中，最可靠最完备的，还只有孙子十三篇一种；这部兵法，不但是孙子在兵学上造诣的结晶，也是集中国古代兵法精华的大成，所以我们读了孙子兵法，就等于读了中国古代的全部兵法一样。

国故学者，对于孙子十三篇的怀疑，在我们研究兵学方面，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研究十三篇，并不是以孙子本人为中心，而是以十三篇内容为精神，只要内容方面，在兵学上有千古不灭的指导精神，就是值得我们来研究的一部兵法，否则，即使是一部真书，但在兵学上没有什么贡献，也仅是一部真书而已。因此国故学者说孙子并无其人，我们可以不加可否，又说孙子之书，是战国相倾之说，我们也不觉得没有理由。但如有人说：孙子之书在兵学上没有一点价值的话，我们则要拿孙子的每一句话，来和他们争辩。要是孙子之书，确是战国相倾之说，而托名于孙武，那末我们只能认为孙子走运，竟做了中国千古之兵圣，绝不因此而减少十三篇的价值。

孙子之书，据史家的记载，认为除了十三篇以外，还有各种遗文流传；周礼注记说：孙子有八陈，有革军之陈。隋书经籍志说：孙子有杂占六甲兵法及八阵图一卷，孙子算经三卷；唐书艺文志说：孙子有兵法提要。这些书我们现在搜集不到，不能判断其价值；因此：也无从和十三篇参照来研究。我以为现在我们研究孙子兵法，只能以十三篇为基干了。

孙子以后，兵家迭出，但是那些兵书，都不能超乎孙子以上。宋朝元丰年间，把太公六韬、尉缭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及孙子十三篇等七种兵书，定名为武经七书。大概以年代定次序，以六韬为第一书，孙子为第二书，吴子为第三书，司马法为第四书，黄石公三略为第五书，尉缭子为第六书，李卫公问对为第七书。后来国子司业朱服（宋乌程人，字中行，熙宁进士，元丰中为御史，章惇欲见而用之，不可，寻劾之。绍圣初，累官礼部侍郎，知庐州，坐与苏轼游，贬兴国军。）则以价值定次序，又把七书次序改为孙子第一。明朝洪武三十年，太祖令国子监将武经七书刊呈，并诏勒将门子弟诵习，以为研究武学的典籍，洪武三十一年，刘寅（明崞县人，洪武进士，所着三略直解，颇能发挥黄老沉机观变之旨，参考诸本，注其异同，较他家特为详尽。）又把七书注解，称为武经七书直解。朱服列孙子为第一书，刘寅的直解，也以孙子为第一，我觉得这种排列的方法，很有见地。因为孙子的书，较其他六书，都来得博大精深，包罗宏富，语虽简约，意义既非常深长，完全是原则的说明，而且这种原则，到二十世纪的现代，还是万古如新。我们如果从战争思想方面来研究，孙子兵法的原则，不但适用于现代的作战，而且成为将来战争新趋势的指导精神。梅国祯（明麻城人，字克生，少雄杰自喜，善骑射，举万历进士，除固安知县，擢御史，脖拜反，诏遣李如松为提督往讨之，命国祯监其军，如松用国祯谋，大破贼，脖拜自焚死。论功擢太仆少卿，累选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卒。）说：「古今兵法，毋虑数十百家，世所尊为经者七，而首孙子。」又说：「古今兵法，尽于七经，而七经尽于孙子。」茅元仪（明归安人，字止生，号石民，崇祯中佐孙承宗军务，历官副总兵，守觉华岛，旋以兵哗，遣戍漳浦，边事无，请募死士勤王，为庸奸所忌，悲愤纵酒而卒，有嘉靖大政类编，平巢事迹考，艺话甲篇，西峰谈话，青油漫史，福堂诗贝余，石民四十集。）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可见孙子十三篇的价值，古今均有同感。

第二 孙子思想基础

孙子思想的基础，在十三篇里没有明显的说明，因为十三篇，是一部关于如何应用原则的书，所以解释得非常简略，孙子为什么不详加解释呢？我以为是由于为进呈吴王的关系，他为取得吴王的信用，非把用兵的要诀，作一个详尽的介绍，才能激动吴王的感情，而对他重用，如果作长篇大论的讲解，对于急于兴兵复仇的吴王（不是一位兵学研究者），倒没有多大的作用。

孙子的基本思想是怎样呢？有否受着过去的哲学影响？历来研究孙子兵书的人，对于这一点，都没有深刻的发挥，照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孙子思想的构成的基础，乃受着黄帝、老子和周易的影响非常之大。

黄帝兵法的精髓如何，我们因没有正确的材料，无从加以判断，或许十三篇中有一大部份，就是转述黄帝思想的。但这种推想，对于我们研究孙子的思想，并没有多大帮助。我认为黄帝之所以能代神农氏而帝天下，完全是从战争中得来的。换句话说，战争是立国的基础，不能战争，就没有国家，国家是为战争而存在，战

争是国家的工具。我们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一个民族的形成，全是由于不断的战争，一个朝代的兴替，也由于战争的胜败，不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是如此，西洋也是如此，于此可见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而是任何一个时代不能避免的。据西洋专家的估计，自有历史以来，三千四百余年中（以西洋为根据）仅有三百三十余年没有战争，其余的时日，全在战争状态中，所以二十世纪的社会，可说是过去不断战争的结晶，将来的时代，也正由二十世纪的战争，在那里孕育着。

黄帝以实战的经验，奠定了他对于战争本质的观念——就是战争为立国的根本，这种观念，虽圣人如汤武，也不能不以战争来收拾天下的残局，取人之国而代之。孙子在当时，受着这种观念的影响非常之深，所以他在十三篇里，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名言，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谨说明社会中有战争那回事存在着，而没有说明战争的本质。我以为是错误的，理由很简单：

- 一、孙子既认为兵是大事，可见他已肯定战争是不可避免，战争有决定和改变人类生活形态的力量。
- 二、春秋之世，兵连祸结，战争占着全部历史，一般的观念，都认为战争是立国拓地之基本手段，是求生存求生活的必要方式。所以对于战争的本质观念，就无加以详尽探讨的必要了。

上面的论述，已证明了孙子的战争基本观念，孙子是肯定战争的，但因为黄帝的兵法，至今没有流传，无从以实际的材料来加以引证。至于春秋时代的社会状况，是否确予孙子以思想上的启发，也因为我们对孙子的身世不甚了解，尤其孙子除这十三篇以外，再没有其他著述，可以供我们证实这一推想的不误。从学术立场来看，我前面的见解，只能说是一种设想，而不是真理，因为缺乏史料的证明。于此我不得不于黄帝之外，再找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易经的战术思想。

「易」是变易交易的意思，「经」是伏羲氏所画的卦，陆德明（唐吴县人，名元郎，以字行，善明理，历任陈隋，高祖时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卒，著有经典释文，诸经音读多特以为据。）经典释文说：「宓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

易经读本注说：「卦者，挂也，悬挂物以示人，二画虽象阴阳之气，求成万物之象，必三画以成三才，但初有三画，虽有象于交通之理，犹未尽，故重之以六画成卦也。」可见易经原来是一部讲求阴阳变易之理的玄书，究竟当时伏羲画八卦，重而为六十四，是否挂象以示人，现在无从研究。周文王拘于羑里，仍作卦辞，以说明每一卦的含义，后来孔子又作序卦传，说明八卦所列次序的意义。这重排列方法，可以证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已发达到极点，从「干」卦起一直到「未济」卦止，所讲的，完全是社会进化的原理，其间对战争的发生，与战争的意义，和现代最进

步的学说，毫无不同。孔子认为天地生万物，故乾坤两卦，为六十四卦之首，万物的生长，必须经过一番培养，尤以人类为然，人类因为寻求饮食，以图生存，于是发生了争端，这是战争的起源，也是战争的人生意义，更证明了，战争是改进人类生活的动力。孙子虽没有承继儒家的思想（因为孙子的生年，约略和孔子同时，孔子晚年始好易，其时孙子恐已死去。）但易经中的战争本质论，仍给予孙子在思想上一个重要的基础。

孙子虽认为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但仍以为战争的方式，不只武力战一种，如果能不费一矢，不折一兵，用伐谋来屈服敌人的意志，乃是最好的战争方式，万一计谋失败，则必诉诸武力，所以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种思想的发生，我认为是孙子受了黄帝七十战定天下，以及春秋时不断发生战争的一种反响作用。七十战而定天下，已足显示战争的惨烈与艰苦，春秋时每次战役的结果，战争者未必能达到预定的目的，胜固有利，败则亡国覆军，所以孙子竭力倡导伐谋的战争，来替代武力的战争，以减少战争所及于国家的危险。

我以为孙子这种思想的形成，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那就是针对吴王心理而发的，吴王登台南向长啸，可知他复仇的心理是非常迫切。但吴在新败之余，国力削弱，是否能实施武力战，颇成问题。因此，孙子以谋攻的战法，来激动吴王重用，也未可知，如果这一种推想是正确的话，那末孙子这种超越战争思想的构成，也是出于偶然的灵感。不过我以为孙子在兵学上的造诣，非常精深，他对于黄帝时代的战争，以及春秋时代战争爆发的因素，以及最后成败的后果，都会加以一番研究，所以历史因素以及时代环境，还是构成他这种思想的主要动力。

黄帝的思想以及战果，给予孙子一个重要的影响的，就是速战速决主义。作战篇里对于这一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历史的事实，使我们认定黄帝，对四方诸侯的七十战，决不是七十次的战鬪，而是七十次的用兵，每一次用兵，一定是时间很短，才能取得胜利。春秋时代诸侯的暴师远征，却又与黄帝的作战相反，因此孙子快速论的构成，实有其至深的含义。

孙子在「兵者国之大事，」不可盲动这一基本观念下，认为遂行战争，必须具备几个战胜条件，那就是他在始计篇所说的：「道、天、地、将、法。」孙子以「道」列为五事之首，很有研究的价值，而且无疑地他是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的混乱，因而应用了老子的学说。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对于「道」的形容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可见老子所说「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而已。「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

老子的这种哲学思想的发生，原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在老子前的三百年（从周宣王二十八年到周敬王二十年）间，可说是一个三百年的长期战争。在这三个世纪中，也不知灭了多少国，破了多少家，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而社会贫富的不均，政府对民众则削夺榨取，使社会入于极度不安的状态。一般的社会思想，有忧时的，有厌世的，有乐天安命的，有纵欲自恣的，有愤世的，老子看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所以主张一切要反诸自然，因而他的政治思想，也着眼在「无为」而治，以攻击当时政府的「有为」而治，他说：「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无为」的政治学说，与欧洲十八世纪的放任主义，颇相类似，主张不干涉政策的，从他「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句话中，就可以推想出老子对于政府权能，所下的限制了。但在春秋时代，老子的学说，不过是一种学说而已，并没有改造当时政治体制的力量，战争还是战争，社会混乱还是社会混乱，政府与人民之间，只有乖离而没有协和，所以孙子虽引用老子「道」的学说，但把他折冲起来，成为一种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可以实现的「道」。

孙子对于「道」所下的定义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令民与上同意，就是举国一致的意思。政府要修明政治，顾虑军事国计民生，激发国民的爱国心理，提高文化水准等等，都是达到令民与上同意的手段，这样，在战争的时候，才能出死入生，使人民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可见孙子所谓「道」，是返诸实现的自然，一切政府的措施，都能合乎规律，规律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也就是「道」，不是像老子那样，返诸自然，而是合乎自然的法则。

孙子认为达到「道」的方法是「令」，他说：「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这就是说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国家的教育管理，以纪律来维持上下的感情，而做到完全服从的地步。所以孙子关于「道」的思想，虽然承继老子的学说，但经其折冲之后，其表现在政治上的，不是不干涉主义，而是干涉主义，他认为极端的放任，不能奠定立国的基础，这样与老子的原意，完全相反。老子是主张绝对的「无为」。孙子主张绝对的「有为」，也合乎自然，也合乎道。这可以说是孙子卓越的创见。孔子所作序卦传，自「比」卦以至「泰」卦这一段，说的也是「有为」的为政之道，但我仍认为在历史的纪年上，孙子的「有为」政治思想，还在孔子以前，所以说他是创见，并不是武断。

道的作用，表现在作战上的，就是上下协同一致，孙子认为这是战胜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天，天是「阴阳、寒暑、时制」。第三个条件是地，地是「广狭、死生、远近、险易」。第四个条件是将，将是「智、信、仁、勇、严」。孙子对于将才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一个将领，必须具备这五种武德，才能深明战法，变化无穷，而取得胜利。军形、兵势、虚实各篇里所讲关于原则的变化运用，

孙子认为全在于为将者的智谋，所以他特别提示为将的重要。第五个条件是法，法是「曲制、官道、主用」。我们如果把上面的五事，加以分析，可知道，天地将法者，实际上就是中国古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大战争要素。天地是天时地利，道、将、法是人和，十三篇的全部意思，都发源于这一点上。

孙子兵法的妙用，就是出奇变化，这种思想的成立，是否祖述黄帝与太公的兵法，我们无法考证，惟发源于易经这一说，是此较可靠的，因为一部易，是讲变易的状态，以为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起于一个「动」字。何以会有「动」呢？这都因为天地之间，本有两种原力，一种刚性的叫做「阳」，一种柔性的叫做「阴」，这刚柔是两种原力，互相推挤，互相调和，于是生出种种运动，种种变化。孔子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系辞传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也是说：「万物是由极简易的，而变为极复杂的。」

孙子兵法中最精警的思想，就是奇正的原理，一切变化，都从这里而发生。这奇正原理和易经上阴阳的原则是一样构，孤阳不长，孤阴不生，纯阳之道，只是健而无变，健之至则衰，无变则不生，自然的原理，固然如此，用兵的原理，也是如此。孙子的所谓正兵，是刚性的战法，作战的时候，敌人如果也用刚性战法作战，则两刚相遇，必兵久而无功，如敌用柔性战法，则柔能克刚，必至败军覆将，奇兵是利，所以孙子认为用兵之道，奇兵与正兵必须配合起来作战，才能像阴阳的配合而生万物，这阴阳相合所生的结果，在哲学上，谓之万物，在兵学上谓之胜利。

奇正的原理，表现在实质现象上，就是虚实的运用，冲虚是奇的手段，备实是正的手段。所谓备实，就是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正兵相合作战的原则，自己的地位稳固以后，然后求敌之虚而攻之，这是运用奇兵作战的原则。说得明显一点，奇兵是求败敌，正兵是求不败，易经说：「坤」有顺德，就是「坤」有应顺乎「干」元的作用，这样阴之能顺乎阳之性，而生万物。用兵也是一样，奇兵必应顺乎正兵的要求，方能发挥奇兵的作用，这就是阴顺阳的道理。阴阳相合而生万物，奇正相合而生的无穷的变化。

易经上对于阴阳这两大原力的配合作用，没有明白的叙述，周文王认为阴阳既能生万物，就可以推知阴阳配合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如果仅仅是单独的一种方式，那末宇宙间，只能有一物，而不能有万物，孙子所说：「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的道理，也是从这种思想里面领悟出来的。奇正配合的方式无穷，所以变化才能无穷。

现在有一般人把战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刚性战法，另一类是柔性战法，速战速决主义是刚性战法，持久抵抗是柔性战法，这种说法，是思想上最大的错误，其实所谓刚性战，是指绝对的进攻或防守主义而说的，柔性战是指利用时空而定作战行动而说的。换句话说：刚性战是打硬仗，柔性战是不打硬仗。但速战速决主义与绝对攻击论，是不同的。速战速决是战略的目的，绝对攻击论只是实现战略的手段，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来说明，德国的闪电战，大家

都知道是速战速决主义，但在实行战争的时候，并没有打硬仗，恰恰相反的，德国只在有利的时期，有利的地点，一举而歼灭敌人，这种方法，并不是刚性战法。所以我要介绍给读者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战略的原理和目的，决没有刚性与柔性的不同，战法才有刚柔的区分。

战法的目的，是在实现战略的目的，战法要实现这个目的，因此战法不能有固定的方式，更不能用纯然刚性或柔性的战法，以配合战略目的，所谓「尽运用的能事」这句话，就是要求刚性战法与柔性战法的配合运用，孙子奇正相生变化原理的精神，即在于此，至其思想的成立，则敢断言：他是领悟了阴阳相合而生万物的哲理。

第三孙子与西洋兵法

孙子十三篇流传到外国去最早的时候，是在唐代，由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到日本去时计算起来，已有一千二百多年。至于流传到欧洲去的时候，我们无法考证，据说：法国到东方传教的教士，曾经把孙子兵法带回法国去，译成法文，拿破仑大帝在纵横欧陆的战阵中，常手不停披的阅读孙子。德国皇威廉第二，在他没落的侨居中，读着欧译的孙子，曾经发过浩叹说：「在二十年前，倘若读到这书，则……」据说他最受感动的是火攻篇里的几句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可见孙子流传到欧洲，一定是时间很早的，所以才有译本。

上面所引证，只是很简单的说明孙子流传到外国去的史实。

孙子对于日本兵学界的影响，非常之大。日本的古代兵法，如甲阳军鉴，信玄全集，兵法纪，兵法秘传等书，其中心思想，都是祖述孙子。此后，注释孙子的书非常之多，而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一部份日本人，认为孙子的理论，不但是用兵的哲理，而且是一部份最好的人生哲学。自从日本接受了西洋兵学思想以后，对于孙子的解说，又有很大的进步，例如：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战，日本联合海军总司令东乡元帅，于对马的大海战，大败俄国的海军，据他自己说，那次的战胜，其阵法是应用孙子的原则，就是从孙子「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这两句话领悟出来的。日本对我的侵略，自外交谋略，以至于作战，更是随时随地，都在应用着孙子的原则。

在西洋兵法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与孙子思想暗合的地方，但他们究竟是否受了孙子思想的暗示，因为没有可靠的材料，不能贸然予以武断的肯定。如果西洋兵法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的发展，那末我们可以断战术思想的成立，中外都出于同一自然律的支配。

从战术的演变上来研究，原人时代就有战术，兵学家说：原始人类的狩猎行为，是战术的雏型。在此我们就发生了一个疑问，即原人时代，人的思想，极不健

全，何以会想出猎兽的方法呢？这个问题的解答，我想这一个根据是出于人类的本能，人在天赋中，已具备了争的天性，因此，才能发生战术上的行动。

人类在猎兽中，当最初一次袭击他的目的物，未必是成功的。其间必有许多人因为求生——猎兽，反而丧失他自己的生命。这种失败，给予未死的人一个重大的教训。他们知道，用某一方法去猎兽，既要丧失生命，就不是一种好方法，于是他们继续研究和试验用新的方法，直到很安全地猎获兽类为止，因此，这种新方法，就成为狩猎的原则。等到人与人争的时候，就是运用人类与兽争的原则，因为人类最初使用的方法，就是猎兽的原则，这种原则，可以称之为单纯的攻击原则，但人的智力，高于动物的智力，这种猎兽的原则，也许遭到严重的打击，如是人们知道真面目的攻击，不是取胜的要诀，就另应用出奇的方法，用出其不意的手段，来袭击敌人。所以我所定的战术上的九个大原则——目的、攻击、集中、机动、安全、奇袭、协同、简单、迅速的成立，都有其一定的历史的发展程序。人类猎兽，是在取胜，所以首先就成立了目的这个原则。为达到取胜的目的，又成立了攻击的原则。真面目的战鬪，未必能取胜，于是发现了集中力量，攻敌弱点的方法，这是集中原则的成立。乘敌之弱，必须明察战机，窥破敌情微妙的变化，才能随时随地冲敌之虚而击破敌人，这是机动原则的成立。要确保自己的机动，自己先要有不败的把握，不被敌人所乘，这是安全原则的成立。自己确保了机动与安全，才能用出奇的方法袭击敌人，这是奇袭原则的成立。奇袭的原则，是运用奇兵，以助主力的战鬪，所以协同作战的要求，较诸密集战鬪时，更为重要，这是协同原则的成立。由于大兵团的运用，指挥统御上，必须力求简单，而攻击重点选定，必须由正面而变为点，这是简单原则的成立。用兵之道，久则无功，这是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这是迅速原则的成立。这种解释，也许有牵强的地方，但我们如仅从历史发展的立场来研究原则的成立，就可以承认我这个观念，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从战术的意义上来分析这九个原则的成立，那末结论必然是不同的。我所以作这样的论述，就是要证明战术上各个原则的成立，是在人类全部战争中，逐次成立的，逐次累积而来的，不是一次就形成这么多原则的。

西洋战术思想的完成，是在克劳塞维慈时代，中国战术思想的完成，远在孙子时代，而且到孙子时，已集思想的大成，发展到顶点。东西的战术思想，相差竟至二千余年，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

第一是由于文化的发达：中国文化到春秋战国时，已有伟大成就，所以战争思想，也有同样的发展。

第二是由于文明主流的内容不同：中国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洋的文明是物质文明，所以中国的战争，是以精神来推动战争思想的，西洋是以技术来推动战争思想的，这是中国军事技术落后的原因，也是西洋战术思想发达过迟的原因。

孙子的战术思想始终站在指导的地位，过去我们没有把他作现代的研究，以致西洋的战术思想，反而支配了全世界的战争精神，现代我们要努力于孙子思想的

阐扬，同时以现代战术来作对照的研究，相信在这研究之中，必能发现宝贵的结论。我们过去写孙子与现在这本书的目的，就在引起大家研究孙子的兴趣，也许中国独立自主的战术思想，从此可以建立起来。蒋（介石）总统说：「大家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一切事物的原理是不变的，原则也始终如一的，好此一二三四五一定总是一二三四五，一加二总是等于三，一加一总是等于二。所以古今中外的战术战略，无论化学利器发明怎样利害，尽管战争的情形和所用的武器是怎样不同，但是战术战略的原则，始终不会变更。所以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些书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有价值，并且其意义亦与日俱新。比方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这不是讲现代的战术吗？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最进步的战术原则。可是我们中国一般没有智识的人，自己国里有很宝贵的东西不知到拿来研究运用，以为陈旧落伍，抹煞一切，只知外国的东西什么都好，想要用，但又学不像用不会，结果使中国军队到如今弄得不成一个东西，要知道我们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军人，切不可自暴自弃，舍近图远，总要诚心诚意，实是求是，精益求精来努力进取。现在中国军队练不好，要给外国人欺侮，不当作我们中国的军队是一个军队，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军人有一个最坏的习惯，以为外国什么东西都是宝贵，我们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废物，没有用的，以致自己固有的什么东西都弃之如敝屣。同时，外国的东西，也只学得一点皮毛，大多数军人都三不四不文不武，外国人不当我们是一个军人，而我们现在用的武器和战术，也是不新不旧，不中不西，说他是完全照中国旧的道理办吗？他又不是，说他是完全照外国新的办法吗？也不是。鉴于以往的失败，我们应当觉悟，以后再不要有新旧和中西的成见，只应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办法来做。」也是这个道理。